

# 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形势及其变化

——从历时最久的流动中得到的启示

Kenneth Roberts

**【摘要】** 文章的目的是探索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潜在动态变化,并以墨西哥劳动力迁移到美国的案例为类比对象。墨西哥 - 美国迁移从开始到现在已经 40 多年了,文章考察了这一时期墨西哥 - 美国迁移形势的主要变化,显示其如何随着来源地、目标地和迁移过程的因素变化而变化,并将这些因素与可能影响中国人口流动的类似因素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 中国 墨西哥 劳动力流动

**【作者】** Kenneth Roberts 美国西南大学经济系,教授。

中国目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并且需要面对受到迁移政策所影响的劳动力市场统一、城市化和乡村贫困等方面有关的选择。试图理解中国劳动力迁移的学者将其与许多历史系统和理论模型进行类比,其中每一个系统和模型都能明确解释特定的迁移系统。虽然中国的案例是独一无二的,但这种类比仍然有用,而且对理解任何系统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本文的目的是探索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潜在动态变化,类比的对象为国际迁移,特别是墨西哥劳动力迁移到美国的案例。如果接受该类比的合理性,则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中国劳动力迁移形势的潜在变化是有用的。

## 一、中国劳动力迁移的本质

目前中国迁移的主要类型是“劳动力迁移”,在这种迁移系统中,工人离开家乡一段时间而在无需技能或低技能的岗位上工作以赚取工资。这种迁移大部分是暂时的。Roberts 等人(1999:242)解释了定义临时迁移系统的条件,即临时迁移系统取决于来源地的经济机会的结构,尽管当地的经济机会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但如果家庭有一个或更多的成员成为迁移劳动力,则家庭就能维持生存。这种劳动力迁移的临时性又经提供临时工作机会的目标地的工作结构而得到强化,这既可能是因为工作的性质,如季节性农业,也可能是因为对永久居留的官方限制。

来源地和目标地所处的条件在当代中国都是存在的。在来源地,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农

---

最近经常被引用的一个模型是 Todaro (1969)模型。这一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迁移模型应用到当今中国是不合适的。这个模型是用来解释为什么在面对城市高失业率时会发生迁移,如 20 世纪 60 年代在拉美和亚非部分地区移民为了等待正式部门的工作而宁愿失业,即使就业的概率很低,但在被保护部门中的城市工资超过农村收入的预期工资。在中国,移民即使不在正式部门工作(或在正式部门工作,工作条件也与城市居民不同),也不会经常失业。

业开始经济改革,农村劳动力都被束缚在人民公社体制内。结果,中国的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完全失衡:1992年,73%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工作,只产生了27%的GDP,而在农业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的其他国家,16%的GDP只使用了44%的劳动力(UNDP,1995)。作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结果,到1995年,32%的农村劳动力都有一些非农就业,而在1981年这个比例是15%(de Brauw等,2002)。

在中国城市,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的结构是以户籍制度为前提的,在改革之前,户籍制度是由三位一体的粮食消费、就业和住房的限制所支撑,这使得要从合法的户籍所在地离开是非常困难的(Cheng等,1994)。尽管粮食消费限制已经不复存在,在大城市里除了少数职业之外,也对所有人开放了,但是,在城市的永久合法居留权,以及在Solinger(1999)称之为“城市公共物品体制”中仍然存在的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住房的额外津贴还是高度限制的。城市住房的高成本使得迁移者只能在大城市的边缘租赁低质量的住处或在商店、建筑工地和餐馆凑合住宿。迁移者经常违反复杂和昂贵的许可体制,其“不合法性”形成了劳动力剥削和阶段性“清理”的基础(Chan,1996)。这些限制又经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长期存在的歧视而得到加强,这种歧视与其他地方所存在的种族划分是同样有力和有效的(Honig,1992)。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和操有地方方言的中国农民对于像北京等城市的当地居民来说是很明显的,并且很容易识别,就像在美国城市中非洲裔美国人对于白种人或者土耳其人对于德国人一样明显(Dutton,1998:9)。

笔者(1997)曾经提过,在当前所有国际迁移的例子中,与当今中国可以进行比较的最相似的案例是从墨西哥到美国的非法移民。除了上述讨论的因素之外,还有两个因素是特别相关的。一是与大部分的国际迁移相比,输出地和输入地在收入上的巨大差距,两者是相对接近的。迁移到中国城市和迁移到美国所挣的收入都差不多是在家里所挣的好几倍。这使得迁移者可以频繁回家,并保持以村庄为基础的强大网络。二是两个国家都存在基于革命历史的土地政策,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土地不能出卖或抵押,而且必须耕种,否则会被没收。这种土地保有制度再加上存在剩余劳动力以及获取商业化生产所需投入品的渠道有限,改变了土地的功能,即从经济单元的功能变成了包括种植业、养育子女、农业副业活动、当地工资性劳动,以及(因为近似)循环迁移在内的多种家庭活动的基础。现在还应该再加上另外一个相似性,即农业自由贸易的影响,在墨西哥有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在中国则是世界贸易组织(WTO)。通过削减补贴和将基本粮食的价格降低到世界市场价格,这两个贸易协定对农民的生活都产生了负面影响(Cornelius等,1993;Bhalla等,2004)。

## 二、诸要素的变化:来源地、目标地和流动过程

20世纪60年代,在墨西哥短期合同工(客工)项目结束之时,连接墨西哥和美国的迁移系统已经生根,并在70年代加速发展。目前,在美国约有980万人是在墨西哥出生,占墨西哥出生的所有人口的9%,并且其中有530万人是非法的(Passel,2004)。Massey等人(2002:66)将1965~1986年这段时期称为“非法迁移的年代”,在这一时期“墨西哥的迁移形势非常稳定”。Cornelius等(1993:156)认为,这一时期从墨西哥到美国的迁移主要是非法的循环流动,大部分年轻的成年男性,离开墨西哥农村社区的近亲,到美国进行几个月(一般是6个月或更少)的季节性农业工作,然后返回来源地。而大多数的迁移者教育水平较低,来自于墨西哥中部的几个州,并且也只在美国的几个州工作,特别是加利弗利亚和德克萨斯(Massey等,2002)。

然而在短短的几年中,季节性的、非法的、区域性的、由农村男性主导的流动,变成了经过城市化的、包含大量女性的永久居民,这些居民日益分散到整个美国(Durand等,1999)。Cornelius等人(1993)认为迁移流形势发生了4个变化:(1)移民的教育水平和技能不断提高;(2)输出地

的日益多元化；(3) 女性和儿童的比例日益增加；(4) 在目标地的定居日益增加。Cornelius 等人 (1993) 假设这些变化是由于墨西哥的经济危机影响了整个国家, 因此带来了新的输出地; 美国对迁移者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 更多地需要掌握较多技能的常年工; 美国通过了使得许多移民合法化的法律; 以及迁移网络的日益成熟。这些变化能够被归类为影响来源地的因素、影响目标地的因素, 以及影响连接两地的迁移过程的因素。

### (一) 影响来源地的因素

在墨西哥向美国迁移的第一阶段, 依赖于农业的人口比例仍很高, 就像今天的中国。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墨西哥的总和生育率都处于 6 以上, 1980 年的年龄结构如图 1 所示, 这保证了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劳动力供给的快速增长。但与土地所有权相对平等的中国不同, 墨西哥的农业发展创造了两极化的农业结构, 一方面是大型的资本密集型农场, 商业作物采用的是机械化生产, 另一方面是小规模的生产单元, 只能提供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一部分。这些小农场中许多是合作农场, 土地集体所有但个人耕种。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 墨西哥 27% 的劳动力都是在农业部门工作, 这些劳动力中的一半在种植利润很低的玉米和大豆, 以至于这个部门虽然只生产了 9% 的 GDP, 却囊括了 2/3 的墨西哥贫困人口 (Latap í 等, 1998)。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削减了投入补贴和价格保护, 并且合作农场制度的解体恶化了这种趋势, 其影响是“将本来农业就业的缓慢萎缩过程压缩到了 10 年或更短的时间” (Latap í 等, 1998: 171)。

在研究墨西哥农业发展的后果时, 发现其影响是增加了迁移, 而不是减缓。迁移到美国的前驱输出地之一是瓜纳托州 (Guanajuato) 的肥沃山谷, 那里农业的绿色革命导致了新作物和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采用, 这减少了农业部门的许多工作机会 (Roberts, 1982)。总体回顾应用于墨西哥 - 美国迁移的迁移理论, 可以发现, 在经历着较快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农村地区, 外迁的几率最高。乡村的经济转型创造了而不是阻碍了国际迁移 (Massey 等, 1997: 968)。因此, 尽管在长期内农业发展可能会导致工资趋同和减少迁移, 但在中短期内这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创造了 Martin (1993) 所称的“迁移高峰”。

在迁移的早期, 中国产生大量移民的因素与墨西哥不同。中国农村家庭平均只有 1/6 公顷土地, 并且迄今为止, 将地块合并成有利于机械化耕种的较大地块的情况还很少。中国整体出生率在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中快速下降 (见图 1), 这与墨西哥在其迁移历史中的类似阶段中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相反, 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是改革前的遗产, 那时农村劳动力都被囊括在人民公社中。

1978 年开始经济改革体制之前, 农业部门吸纳了 74% 的劳动力。随着其他机会的开放, Rawski 等人 (1998) 估计 1979 ~ 1993 年间劳动力需求下降了 31%。但在出生率下降之前出生的大量年轻人继续进入劳动力大军, 因此直到 1991 年, 尽管农业劳动者比例是下降的, 但是绝对人数是增加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农村地区吸收了劳动力增长中的 71%, 其中大部分人都在乡镇企业, 乡村工业化提供了一个替代迁移到城市的机会, 即“离土不离乡”。乡镇企业早期的成功归功于转型时期中的独特环境 (Jefferson 等, 1994), 90 年代城市吸收了劳动力增长中的 86% (Knight 等, 2005)。

2000 年农业劳动者的数量为 3.28 亿, 占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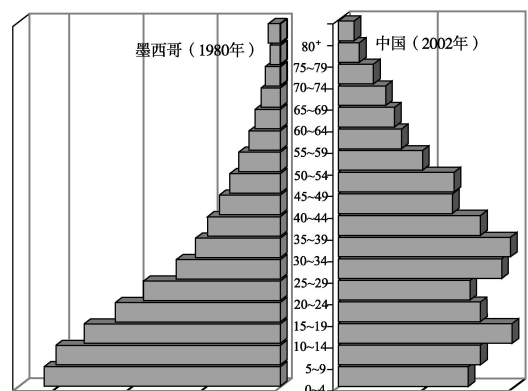


图 1 墨西哥 (1980) 和中国 (2000) 的人口年龄结构

部劳动力的46%,农业剩余劳动力为1.52亿(Aubert等,2002)。这些数字不只反映了没有工作的实际人数,更为重要的是这对城市认知产生了深刻影响,因为农业的季节性会导致在一年中的部分时段中产生劳动力短缺(Bowlus等,2003)。但大部分的农村家庭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有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并且这些劳动力都在各种各样的非农工作中就业,包括自雇、当地工资性劳动和迁移(Cook,1999)。

根据普查数据,1990~2000年,在全部农村家庭纯收入中工资的份额从20%增加到31%(Ma,2004)。1995年在8个省份对4000个农户的调查发现,种植业的日收入为9.4元,而乡镇企业的日收入为12.7元,外出打工者的日收入为17.4元(Knight等,2003)。在河北、河南和广西地区,迁移收入在农村纯收入中的贡献份额超过了10%,安徽省达到16%,四川省为17%,湖南省为20%,江西省为25%(Ma,2004)。除了从种植业中得到的报酬低之外,20世纪90年代在一些地区,财政紧张的当地政府所征收的税费更达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由于土地所提供的保障,大部分生活在农村的中国人并不愿意放弃土地。在广东省调查的农村流动劳动力中,86%不准备放弃其土地(Woon,1993)。对于就业不稳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来说,一个重要的保障功能就是当他们生病或者没有工作时还可以返回家乡(Nielsen等,2004)。类似的情况在墨西哥也存在,作为美国社会的边缘工人,大部分都不能得到丰衣足食的生活,因此他们必须保持与土地的联系,包括保留对合作农场财产的权利(Fletcher,1999)。

在中国,劳动力和农业设备的农村要素市场是不发达的,如在山东省寿平县所使用的农业劳动力中只有1%不是家庭成员(Bowlus等,2003),并且许多农村流动劳动力一年返乡一次或两次,为自己的农地工作。这一直是对迁移的一种约束:在想迁移但还没迁移的家庭中,接近1/5的家庭因为从种植业中抽不出劳动力(Knight等,2005)。但是,土地租赁变得越来越常见,在1995年只有3%的土地被租赁,而农业部在1999年的调查中,发现在6个省份中有14%的土地被租赁,2/3的租赁土地不要求报酬,但需要承担上缴公粮的义务(Kung,2002)。在浙江省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中,2003年租赁比例上升到25%(Rozelle等,2005)。

如果中国沿着墨西哥的迁移道路走,则农村地区的社会和文化变化与经济变化一样,也会对迁移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于两个国家农村地区的年轻人来说,迁移提供了摆脱繁重农业工作和乡村生活限制的机会。1989年在墨西哥所做的调查发现,在外迁比率较高的社区,年轻一代的工人不愿意从事家乡的农业工作,即使工资高于一般的当地工资,即使这样的工作可以常年得到(Cornelius等,1993:503)。在中国明显存在一代被称为“打工族”的农民工,他们没有从事过种植业,并且对他们来说,迁移是公认的能够过上更好生活的途径。在中国沿海3个城市对年轻移民的调查发现,即使在农业部门所挣的收入与在城市中所挣的相同,72%的人还是愿意选择留在城市(Wang,2003)。对于进入劳动力大军的年轻移民来说,种植业是一条“死胡同”;迁移至少能够提供机会,尽管成功的机率很渺茫。

影响来源地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返回到农村的移民所带回的资金和技术的转移能否导致农村的发展。至少,贫困地区人口的迁移可以减少农村的贫困和不平等。Taylor等(2003)认为,迁移汇款可以减轻在农村信用上的约束,并促进投资。尽管该假设在墨西哥也得到一定支持(那里汇款的主要用途与中国相同——住房和消费),但也存在这种情况:汇款最有可能被投资在有活力的农村社区中,这会恶化一国区域间的不平等(Lindstrom,1996)。Murphy(2002)发现,在中国江西省的一些地区自主创业有所增加,特别是当地方政府出面推动时,而de Brauw和Rozelle(2002)发现,只有很少的汇款是投资在生产活动中。1999年在安徽和四川省的调查发现,在非农活动中的投资非常少,以至于作者将该假设称为“创业神话”(Bai等,2003)。不过,

如果移民在城市中获取了技能,则当他们返回家乡时,确实会转向非农职业(Ma,2001)。

影响来源地的因素——人口情况、土地所有制结构、农业技术、农村发展、文化变迁,这些因素起作用的方向与在墨西哥是一致的,即减少农业部门所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在这些农村因素上,中国也存在重要的差别,一些因素起作用的方向可能是相反的,例如土地所有制结构,或者一些并没有那么严重,例如人口情况。中国很好地遵循了台湾省、韩国和日本的东亚模型,那里土地所有者是业余的农场主,但这需要政府方面承担保护农业和建设包括医疗、教育在内的农村基础设施的巨大责任。虽然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结构正在演变,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必然会下降。

## (二) 影响目标地的因素

影响墨西哥-美国迁移过程的第二类因素是目标地的经济和政治变化。虽然讨论迁移劳动力的可及性对于美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足以判断经济的特定部门,特别是在经济繁荣的美国西南部,在20世纪80年代时期变成了由墨西哥的迁移劳动力所主导。

美国经济对迁移劳动力的日益依赖和这种劳动力可感知的社会成本导致了在1986年的移民政策的重大变化——通过了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作为雇主、隶属于工会的劳工、迁移利益群体和感到国家已经丧失了对其边界的控制的人们之间利益的折中,该法案的意图是使长期居住者合法化,同时对未来的进入者闭紧大门。大多数专家认为,该法案没有达到第二个目标,不仅没有减少非法进入者,而且使得已经在这个国家非法居住的人更不可能返回家乡(Donato等,1992)。这一法案的通过预示了“墨西哥人移民到美国的新时代”(Durand等,1999)。

墨西哥迁移对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影响,在过去特别是在高失业率时期一直是非常突出的问题,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争议(Borjas等,2005)。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后5年内中国城市企业的改制使得3400万工人下岗,1996~2002年中国城市实际失业率从6.1%上升到11.1%(Giles等,2005)。一些城里人将这些下岗与外来流动人口的就业联系起来。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面对市民的担忧,出台了详细的条例来对流动人口所允许就业的工作类型进行限制,这些条例被普遍忽视,并且最近被一并撤销了。

事实上大部分的中国移民诸如那些在建筑业、其他体力劳动、小买卖和服务业中工作的民工,并不与城市居民直接竞争工作。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失业并不是主要的问题。相反,在广东和福建等出口制造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在极大程度上,目前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对移民还是正面的,对于国家层次上的经济现代化和地方层次上的城市居民物质生活的提高,流动人口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中国城市中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与美国的墨西哥移民一样非常艰难。与在美国一样,在政策和执行中所反映的经济考虑和社会考虑之间的平衡是影响身处目标地的移民的主要因素。

尽管从1984年就允许迁移,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迁移都还没有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但从1989~1990年的经济滑坡恢复之后,流动人口日益增加的数量成为人们日渐关注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是农村迁移劳动力被称为“盲流”的阶段,人们认为是流动人口造成了伴随着转型的许多问题(Davin,2000)。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采取各种监管和措施的基础。

然而,由于政府其他机构的利益,这些严厉的措施受到越来越多的争议。对于税费的征收存在着竞争和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因此寻租的机会涉及到多个部门(Solinger,1999:56),而这些部门没有一起织出一张更严密的监管网。农业部、地方政府和劳务输出公司都是受益者,并且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外出迁移,例如四川省湖州县2000年派出37支工程队和120000民工(Mobrand,2004)。可见迁移并不完全是“盲目的”。由于控制迁移阻碍了有效劳动力市场的发

展,并且妨碍了中国利用其在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20世纪90年代末和之后的几年中,各级政府修改了相关法规,使迁移到城镇和小城市更为容易,给予投资者和买房人永久居住权、甚至对户口的主要分类进行了改革。然而这些改革都没有威胁到将大多数农村移民排除在城市永久居住之外的体制。

对于子女的教育,与迁移到美国的墨西哥移民相比,中国流动人口更是处于不利地位,墨西哥移民的子女在教育上有保障,而且如果是在美国出生,就有权申请市民资格。1998年之前,中国城市没有义务教育,户口不在本地的农民工子女,城市本地学校对其的收费高得令人望而却步。许多民工子女不得不在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然而这些学校虽然收费低,但质量很差(Kwong,2004)。

### (三) 影响迁移过程的因素

影响墨西哥迁移的变迁的最后一类因素,是连接来源地和目标地的迁移过程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关于美国就业机会和生活的信息更加充分;因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人们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联络更便捷、更便宜;以及最重要的因素——迁移网络更成熟。迁移网络降低了迁移的成本和风险,为网络成员提供了“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由于累积效应,会促进来自特定输出地的迁移,并且集中于特定的目标地(Massey等,1994)。

随着迁移网络的成熟,网络对迁移进程产生了相悖的影响。尽管网络能将迁移集中在某些区域之间,并且输送至特定的职业,但由于通过网络所提供的接触,网络成员还可以拓展新的就业机会,因此网络也可以扩展职业和区域(Roberts等,2003)。网络能将具有更多技能和受过良好教育的迁移者带到特定职业,同时也能赋予没有受过教育或缺乏技能的人们以社会资本,从而增加他们的迁移可能性。因此,甚至在历史上的墨西哥案例中,仍然存在关于这些因素净影响的争论(Durand等,2001; Marcelli等,2001)。达成共识的是,迁移网络的成熟导致了跨国社区的形成(Roberts等,1999)、迁移流的女性化和定居的增加。

许多学者强调网络对于流动人口的重要性。目前中国一些地区之间的非正式网络有些在正式联系方面已经制度化了,比如在主要目标地设立代表县级和省级政府的流动人口中心。与墨西哥相比,中国流动人口网络的形成才刚刚开始,并且在中国农村还有很多地方很少有人迁移到外地工作(Ma,2004)。1995年对8个省4000个农户的调查显示,超过1/3的家庭想增加迁移,但由于缺乏联系(36%)和信息(25%)而没有迁移。在那些不想继续迁移的农户中,17%认为迁移太不安全,9%列出了迁移的成本和艰辛。大多数没有考虑迁移的人表示,缺乏信息是惟一的、最大的限制因素(Knight等,2003)。随着网络的成熟,这些限制将会逐渐减弱。

影响墨西哥-美国迁移过程的一个重要的连续条件是长期存在的较大工资差别(Massey等,2002)。按照经济理论的预测,如果这种工资差别变成零,则迁移的原动力就不存在了。在中国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的区域收入不平等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增加的。作为对收入差别的响应,迁移在1995~2000年之间显著增加。

收入差别是继续增加还是稳定或下降,部分取决于迁移政策。Zhai和Wang(2002)使用动态的一般平衡模型来估计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且发现,整个乡村就业减少而迁移增加。如果劳动力流动继续被限制,则城乡差距将会增大,而如果城市工资保持不变,则城市失业将急剧增加。城乡差距会下降的惟一一种情况是,当对迁移的控制有所放松时,则雇用没有技能的劳动力的城市工资可以是下降的。城市-农村和内陆-沿海在收入不平等上的差距将转移到城市,即城市居民将会与移民竞争低技能的工作。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收入不平等随着技术的进步是增大的,因此很难预测那些受影响的人群的反应对于政策的净影响。

### 三、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潜在变化

如果中国的迁移过程对上述因素变化的反应,与连接美国和墨西哥的迁移过程的反应方式类似,则我们能够期望看到中国迁移形势的如下变化:向沿海城市的迁移更多,原因是在目前的输出地中迁移进一步强化,而且迁移向新的区域扩散;目标地内部的职业更加多元化,导致了技能和教育水平更高的迁移者增加;在迁移流中出现更多的妇女和家人,以及更多的定居。下面简要地探索中国人口迁移中的每一个潜在变化。

#### (一) 迁移流动人口的数量和地区特征

中国人口迁移的数量巨大且不断增加鲜有争议,迁移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随后保持稳定增长,尽管在90年代后期中国GDP增长放慢时,迁移增长没有那么迅速(Bai等,2003),但农业部的年度调查显示,1994年工作于所居住的乡镇之外的劳动者为6400万,在1997年增加到了6700万。而由国家统计局所做的调查发现,离开户口所在地至少6个月的人,1996年为5800万,1999年增加到6400万(Goodkind等,2002)。200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7900万人跨县迁移,4200万人跨省迁移。

我们分析影响来源地、目标地和迁移过程的因素,主要是为了预测未来20年中中国的新增迁移。虽然进入劳动力大军的相对人数是减少的,但绝对人数仍然巨大,且绝大多数不会成为农民。大多数的政策制定者都很清楚,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不在农村,“离土不离乡”必然会变成“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通过累积效应,迁移网络的日渐成熟将会导致更多的迁移。迁移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省际之间,而不是局限于当地。Fan(2005:21)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新增的迁移主要是集中到几个目标地并且仅来自几个来源地,他将这种现象称为“空间聚集”。

相同的空间聚集也发生在墨西哥-美国迁移的早期。当时,由于累积效应和在传统的输出地社区非移民所感到的“相对剥夺感”,大多数的移民都来自墨西哥中部的几个州,并主要迁移到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Massey等,1994)。如前面所提到的,迁移汇款并没有用于这些社区的生产性投资,这导致了迁移的专业化并且产生了专门为在外工作的移民服务的“托儿所和看护之家”。但是,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情况的恶化和整个国家陷入危机,迁移从中部州的传统输出地扩展到了周边地区。即使在不会说西班牙语的瓦哈卡州(Oaxaca)的本地人中,在80年代也有很多人开始加入了迁移流。

在中国,1989~2001年,高迁移率省份的人口众多,如安徽、河南、四川(包括重庆)和江西省的人口为2.8亿,这4个省份对迁移的依赖性最强。这些省份和其他高迁移率的省份的累积效应导致了他们对移民总量的相对贡献在短期还是处于上升的趋势。如果中国遵循墨西哥的路径,则若遭遇危机或农村条件的稳定恶化,则我们可以预期,将会产生迁移来源地的扩张,并且输出量小的省份对于省际迁移的负面影响会下降,这将进一步增加迁移的数量。

墨西哥-美国迁移的区域特征的另一主要变化是扩张到了非传统的接收地。1990~2002年间,在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和亚利桑4个传统接收地之外的墨西哥移民的数据增长了5倍,而在1990年在这些州的移民数量占到了87%(Passel,2004)。虽然这种空间的多元化需要在非传统的接收地也达到一定的繁荣水平,这是中国目前还远达不到的,但越来越多的乡村至乡村迁移填补了向外迁移的农民所留下的“空白”(Lohmar等,2000),并且将来,较高的沿海地区工资和政府政策可能会提升内陆和西部的发展。作为最早的迁移流之一的浙江省温州市的移民已经开始扩散,即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在向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聚集之后转向小城市。

(二) 职业多元化和教育

20世纪60年代,迁移到美国的墨西哥移民主要是从事农业。在70年代和80年代,他们分散到餐饮业和建筑业,并且如上所述,在90年代后期,他们已经工作于美国经济的每一个部门(Borjas等,2005)。在中国,我们看到了类似的职业多元化,从建筑业和工厂工作,到零售业和服务业中的更多工作。移民长期为城市居民提供商品和服务,并且种类和精细程度是逐年增加的。随着中国生产更多的高科技产品,工厂工作很可能变得更加技能密集型;工厂对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女性在工厂工作的比例较大,因此较高的教育水平对提高女性迁移的可能性的作用比男性的作用要大(Zhang等,2004)。可见职业多元化与迁移劳动力的性别比例是相关的。

(三) 女性和家庭

墨西哥-美国迁移进程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变化是更多的妇女和儿童参与迁移,以及更多的定居,这两点都非常重要且紧密相关。因为女性是定居的基础,通常也是定居的动力所在。

墨西哥迁移流一直有一个逐渐女性化的过程,这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早期,并于20世纪90年代突然加速(Marcelli等,2001:111)。对墨西哥-美国迁移主要的两国研究发现,普遍认为90年代中期在美国有更多的女性和儿童加入进来,依托的社区研究表明,两个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更多的女性似乎已经决定在美国生活会更好,在美国小孩可以完成中学教育。其次,许多男性显然希望妻子在美国的收入可以支持他们自己在美国的生活(Latap i等,1998:230)。

中国迁移的早期,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是男性,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情况开始改变。流动人口的连续调查显示,不仅在像上海市这样的主要目标地女性移民的比例增加了,而且在广东省这样最重要的迁移目标地,许多年轻女性是出口制造业的首选劳动力,增加了在迁移流中的比例。促使女性迁移的原因与男性是不同的,中国尤其如此。在天津市,女性移民正在打破男人、传统和国家所施加的重重限制。女性移民被访者有一种共同的想法,即在城市工作的最大收益是迁移改变了她们的生活和命运(Zhang,1999:38)。

1995年,在北京、武汉、苏州和深圳4个城市的调查发现,在这些城市1/3的民工都是有配偶陪伴的(Knight等,1999),这与笔者两年前对上海市的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分析是一致的(Roberts,

2002)。2000年在安徽和四川省农村女性的调查显示,年轻女性的迁移有增加的趋势(Roberts等,2004)。图2表明,在最近几年队列和时期效果造成更多的女性迁移。在每一个时期,更为年轻的队列较之年长的队列更可能迁移,并且在近期内所有年龄组的女性迁移都增加了。

调查还显示,安徽和四川省女性移民中有62%直到平均结婚年龄21.7岁之后,才进行第一次迁移,并且到这个年纪,有超过一半的女性移民已经结婚了才进行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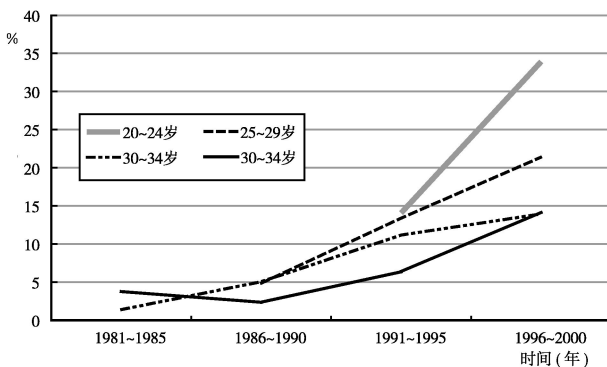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分年龄组妇女第一次迁移时所处时期的百分比

还需要解释为什么在表示潜在迁移时间的线中较年轻队列的线比较短。目前35~40岁之间的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已经15~20岁了,因此在劳动力迁移的最初阶段就开始迁移。那些30~34岁之间的女性有一些在1980年的前5年已超过15岁,因此也能够迁移。25~29岁的女性到1985年之后才到15岁,最年轻的队列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迁移。



次迁移。在后续的迁移中,已婚女性移民的比例甚至更高,在完成了第一次到第三次迁移的女性移民中,有 $2/3$ 是熟练工人且已婚。在上海市对城市流动人口的调查支持了这次农村调查的结果,上海市的调查显示,1993~1997年在农村女性迁移劳动力中,已婚女性的比例从52%上升到6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24岁年龄组的变化,其中已婚移民的比例几乎翻了1倍,从18%上升到34%。

墨西哥-美国迁移中的大部分女性都是跟随丈夫和家庭的。在安徽和四川省农村的调查发现,约一半的女性是独自迁移,一半是有丈夫陪同。由于 $2/3$ 的女性移民是已婚者,因此这就意味着来自安徽和四川省的女性移民中有 $1/3$ 是夫妻一起迁移的。

已婚女性迁移的最大约束是作为母亲的责任。有调查发现,女性初育的平均年龄为22.8岁。然而对于迁移而言,孩子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样本中 $4/5$ 的农村流动人口在进行第一次迁移时已经有孩子。在有孩子的女妇中, $3/4$ 把孩子交给其祖父母照看。另外,与丈夫一起迁移的女性中约有 $1/4$ 把孩子带在身边,这就造成了前面所讨论的流动人口子女的上学问题。类似的,在墨西哥,有孩子也没有降低女性非法迁移的可能性(Donato等,2000)。

性别和婚姻状态与在目标地的职业非常相关。在来自安徽和四川省的女性流动人口中超过一半是企业雇员,通常为工厂的工人。另一方面,对于已婚女性,工厂工作只是对首次迁移并且没有丈夫陪同的女性移民而言,是主要的劳动形式,而对于不是初次迁移或者与丈夫一起迁移的女性移民来说,在各种不同的职业上的分布相对平衡。多变量分析表明,在除了工厂之外的其他地方工作的已婚女性,与丈夫一起迁移的可能性要大很多。这部分是由于与工作相关的住宿类型,因为工厂通常为工人提供同性别的集体宿舍。一个相关的解释是一些类型的工作,例如家庭装修、从事贩卖和食品加工等工作,允许夫妻一起有效率地工作并能挣更多的钱。

上海市的调查显示,在1993年和1997年之间,女性迁移劳动力的职业有显著转变。在1993年,女性移民中最大的职业/部门是乡镇企业,这些工人中不到 $1/3$ 是已婚的。到1997年,职业为体力劳动者(通常为工厂工作)或手艺人女性迁移劳动力的比例从总数的64%下降到了44%,从事建筑业、农业、工商业、保姆的比例保持不变,而那些从事“其他职业”的比例从总数的2%上升到了21%。在乡镇企业工作的比例从40%降到了16%,而在私人部门工作的比例从15%上升到了23%,自我雇用的比例从27%上升到了39%。由于自我雇用的工人和那些不在工厂工作的劳动力,大多数是已婚的,因此在上海市,此类职业的转变伴随着已婚女性迁移劳动力的比例上升。

总之,上述发现证明了中国农村女性迁移的显著多元化。迁移的女性有已婚的,也有单身的,有与丈夫和子女在一起的,也有不与丈夫和子女在一起的。不管是对于迁移的还是非迁移的女性来说,20岁出头结婚,随后就会生孩子,但这些终生大事并不会构成不可逾越的迁移障碍。中国女性的迁移模式多元化与墨西哥女性的迁移形成鲜明的对比,迁移到美国的墨西哥女性主要是与丈夫和其他的男性家庭成员一起迁移。在美国,低技能的工厂工作是萎缩的,而不像中国,工厂工作不断扩张并可以吸纳年轻的单身女性就业。对于年轻的中国女性移民来说,更为适合的类比对象是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上的墨西哥组装工厂工作的年轻墨西哥女性(Cravey,1998),没有证据表明墨西哥女性在那里工作会导致随后迁移到美国。

#### (四) 定居

墨西哥迁移趋势的最后一点是在目标地定居者越来越多。尽管在墨西哥和在中国大多数的移民并没有表示出留下来的意图,但移民工人的定居显示出缓慢上升的奇异轨迹(Hondagneur-Sotelo,1995:1)。Marcelli和Cornelius(2001)估计,1980~1992年,迁移流中返回到墨西哥的比例下降了28%,这和迁移的女性化有关。Massey等人(2002)计算,在墨西哥迁移的两个主

要阶段之间,回流的年概率从 0.25 降到 0.07,这意味着停留时间的中值从 2.4 年上升到 8.9 年,在美国居住的迁移人口增加了 3 倍。

前面针对中国年轻女性移民讨论了自治和自由,而对于墨西哥女性来说,她们在美国享有的自治要大得多,并且普遍表达出永久居住的偏好(Hondagneur-Sotelo, 1995)。Reyes (1997)发现,女性移民中有 45% 在美国待的时间超过了 10 年,而在男性移民中这个比例只有 26%。在河北省所调查的移民中,与男性相比,更多的女性羡慕城里的生活,希望和家人在一起,并且更渴望放弃农村生活并在城里定居(Song, 1999:88)。

关于在中国城市的定居,惟一的证据来自于连续的城市流动人口调查,该调查可以进行迁移时间的比较。在 1988~1993 年间,上海市流动人口的停留时间相对比较稳定,69%~71% 的人停留的时间不到 1 年。但停留时间短于 1 年的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比例,从 1993 年的 73% 下降到 1997 年的 51%,同时,那些停留 1~5 年的移民比例从 24% 增加到 39%,停留 5 年以上的移民比例从 4% 上升到了 10%。根据对这些调查中的整个流动人口的分析而不仅是移民的分析,可以得出居住时间变长这表明相当比例的移民明显是在上海市定居了。

#### 四、结 论

自从墨西哥短期合同工项目结束之后和墨西哥到美国的非法劳工移民开始以来,已经有 40 年了,期间迁移流的情况发生了显著改变。本文使用迁移流的变化来确定影响其随时间演变的关于来源地、目标地和迁移过程的因素,并且考察可能影响中国迁移的动态变化的类似因素。理解这些动态变化对于形成合理的政策非常重要,对于解决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中的一些问题,例如农村贫困、城市化的步骤和特征、劳动力市场的演化以及人权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墨西哥人迁移到美国的过程中发生了 4 个主要变化:从更多来源地到更多目标地的更多迁移、职业多元化和教育与技能密集型、更多的妇女和儿童,以及更多的定居。尽管在影响这些变化的来源地因素方面,墨西哥和中国存在一些重要的不同,但总体结果可能是相同的——农业需要较少的劳动力,大批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不满足于将种植业作为职业和将村庄作为未来。同样的,随着迁移网络不断拓宽和加深,迁移过程可能也是以类似的方式进展的。这也将提高迁移的强度,并且能够在多元化之后引发空间和职业聚集。网络可以具有相悖的影响,因此重要的不是要进行具体预测,相反,有必要密切关注移民网络的演化,以及当地和政府机构、私人雇主在促进或阻碍这些网络运作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目标地因素是造成这两个过程最大差别的潜在原因,但经济和社会因素的相互影响在两个国家中是很不相同的。美国是“移民国家”,因此反移民群体必须找到其他的理由来进行反对,而中国具有“位置嵌入型社会控制范式”的长期传统,这允许政府政策在意识到问题存在时陡然采取改变措施。在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移民和本地人之间的竞争还很少,但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变和移民人力资本在长期的提高,这种情况会很快发生改变。一旦跨过边界,在美国定居是很容易的,而且每一个孩子都有权接受教育。在中国,住房和教育是对定居的两个最大障碍。户口政策是这些问题的中心,不过最近的变化趋于放松,有利于移民的融合和有效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从某一方面看,中国迁移的进程比墨西哥要快很多。在迁移过程较早的阶段就有更多的女性到来,更多的单身女性在工业部门工作,更多的已婚女性不随丈夫迁移。这部分是由于两个目标地的劳动力市场的不同所引起的。如果美国-墨西哥边界地区也被看做是目标地的一部分,则差别会缩小,而且中国城市的服务业在移民进入之前是不存在的。但中国女性似乎以墨西哥女性从未尝试过的方式抓住了改变自己生活的机会,其家庭也将对中国迁移的未来产

生重要的影响。

### 参考文献：

1. Aubert, Claude, and Li, Xiande (2002), Agricultural Underemployment and Rural Migration in China: Facts and Figures. *China Perspectives*, 41: 47-58.
2. Bai, Nansheng, and He, Yupeng (2003),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versus Continuing to Work in the Cities: A Study on Rural Urban Migrants and Their Return to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4/4: 149-58.
3. Bhalla, A. S., and Qiu, Shufang (2004), *The Employment Impact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4. Borjas, George J., and Katz, Lawrence F. (2005), *The Evolution of the Mexican-Born Workf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1281.
5. Bowlus, Audra J., and Sicular, Terry (2003), Moving Toward Markets? Labor Allocation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1/2: 561-583.
6. Chan, Kam Wing (1996), Post-Mao China: A Two-Class Society in the Ma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 134-150.
7. Cheng, Tiejun, and Selden, Mark (1994),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139: 644-668.
8. Cook, Sarah (1999), Surplus Labour and Production in Chinese Agriculture: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Dat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5/3, Special Issue: *The Worker's State Meets the Market: Labour in China's Transition*, Sarah Cook and Margaret Maurer-Fazio (eds.): 16-44.
9. Cornelius, Wayne A., and Martin, Philip L. (1993), The Uncertain Connection: Free Trade and Rural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7/3: 484-512.
10. Cravey, Altha J. (1998), *Women and Work in Mexico's Maquiladora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1. Davin, Delia (2000), Migrants and the Media: Concerns about Rural Migration in the Chinese Press, in Loraine A. West and Yaohui Zhao (eds.), *Rural Labor Flows in China*. Berkeley,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78-291.
12. de Brauw, Alan, et. al. (2002),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s During the Reform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0/2: 329-353.
13. de Brauw, Alan, and Scott Rozelle, Scott (2002), Household Investment through Migration in Rural Chin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Williams College.
14. Donato, Katharine M., and Kanaiaupuni, Shawn Malia (2000), Women's Status and Demographic Change: the Case of Mexico-U. S. Migration, in Brigida Garcia (ed.) *Women, Poverty, and Demographic Chan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17-242.
15. Donato, Katherine M., Durand, Jorge, and Massey, Douglas S. (1992), Stemming the Tide? Assessing the Deterrent Effects of the 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 *Demography*, 29/2: 139-158.
16. Durand, Jorge, Massey, Douglas S., and Parrado, Emilio A. (1999), The New Era of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6/2: 518-536.
17. Durand, Jorge, Massey, Douglas S., and Zenteno, Rene M. (2001),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ities and Change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36/1: 107-126.
18. Dutton, Michael (ed.) (1998), *Streetlife China*, in *Cambridge Modern China Series*, William Kirby (ed.),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 Fan, C. Cindy (2005),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990 and 2000 Census Comparisons.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57/2: 295-311.
20. Fletcher, Peri L. (1999), *La Casa de Mis Sueños: Dreams of Home in a Transnational Migrant Communit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1. Giles, John, Park, Albert, and Zhang, Juwei (2005), What is China's True Unemployment Rate. *China Economic Review*, 16/2:149-170.
22. Goodkind, Daniel, and West, Loraine A. (2002),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Definitions, Estimates and Recent Findings. *Urban Studies*, 39/12: 2237-2250.
23. Hondagneur-Sotelo, Pierrette (1995), *Gendered Transitions: Mexican Experiences of Immig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4. Honig, Emily (1992),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5. Jefferson, Gary H., and Rawski, Thomas G. (1994),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8/2: 47-70.
26. Knight, John, Song, Lina, and Jia, Huaibin (1999), Chinese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Enterprises: Three Perspective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5/3, Special Issue: *The Worker's State Meets the Market: Labour in China's Transition*: 73-104.
27. Knight, John, and Song, Lina (2003), Chinese Peasant Choices: Migration, Rural Industry or Farming.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31/2: 123-147.
28. Knight, John, and Song, Lina (2005), *Towards a Labour Market in China*.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ank Dikötter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9. Kung, James Kaising (2002), Off-Farm Labor Markets and the Emergence of Land Rental Markets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0/2:395-414.
30. Kwong, Julia (2004), Educating Migrant Children: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The China Quarterly*, 180:1073-1088.
31. Latapí, Augustín Escobar, et. al. (1998), Factors that Influence Migration, in *Migration Betwee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Binational Study*. Vol. 1. Washington, D. C. and Mexico City: U. S. Commission on Immigration Reform and Mexic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63-250.
32. Lindstrom, David P. (1996), Economic Opportunity in Mexico and Return Migr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emography*, 33/3: 357-374
33. Lohmar, Bryan, Rozelle, Scott, and Zhao, Changbao (2000), *The Rise of Rural-to-Rural Labor Markets in China*. Working Paper No. 00-020,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
34. Ma, Zhongdong (2001), Urban Labour-Force Experience as a Determinant of Rural Occupational Change: Evidence from Recent Urban-Rural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33/1: 237-255.
35. Ma, Zhongdong (2004), Labor Migration as a New Determinant of Income Growth in Rural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Boston, Massachusetts, April 1-3.
36. Marcelli, Enrico A., and Cornelius, Wayne A. (2001), The Changing Profile of Mexican 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New Evidence from California and Mexico.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36/3:105-131.
37. Martin, Philip L (1993), *Trade and Migration: NA FTA and Agriculture*. Washington, D. C. :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8. Massey, Douglas S., et. al. (1994), An 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ory: The North American Cas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4: 699-751.
39. Massey, Douglas S., and Espinosa, Kristin E. (1997), What's Driving Mexico-U. S. Migration? A Theoretical, Empirical, and Policy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4: 939-99.
40. Massey, Douglas S., Durand, Jorge, and Malone, Nolan J. (2002), *Beyond Smoke and Mirrors: Mexican Immigration in an Era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41. Mobrand, Erik (2004), Beyond Household Registers and Floating Populations: Migration Controls and their Demi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Cities in China: The Next Generation of Urban Research*, December 12-14,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42. Murphy, Rachel (2002),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Cambridge Modern China Series. Wil-

- liam Kirkby(ed).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3. Nielsen, Ingrid, Smyth, Russell, and Zhang, Mingqiong (2004), Unemployment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Jiangsu Survey Dat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
  44. Passel, Jeffrey (2004),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S: The Latest Estimates, from *Migration Information Source*,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
  45. Rawski, Thomas G., and Mead, Robert W. (1998), On the Trail of China's Phantom Farmers. *World Development*, 26/5: 767-781.
  46. Reyes, Belinda I. (1997), *Dynamics of Immigration: Return Migration to Western Mexico*. San Francisco: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47. Roberts, Bryan R., Bean, Frank, and Lozano-Ascencio, Fernando (1999), Transnational Migrant Communities and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2: 238-266.
  48. Roberts, Kenneth (1982), Agrarian Structure and Labor Mobility in Rural Mexico.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8/2: 299-322.
  49. Roberts, Kenneth (2002), Female Labor Migrants to Shanghai: Temporary Floaters or Settler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6/2: 492-519.
  50. Roberts, Kenneth, and Morris, Michael (2003), Fortune, Risk and Remittances: An Application of Options Theory to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Based Migration Network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7/4: 1252-1281.
  51. Roberts, Kenneth, et. al. (2004), Patterns of Temporary Migration of Rural Women from Anhui and Sichuan Provinces of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52: 49-70.
  52. Rozelle, Scott, Huang, Jikun, and Otsuka, Keijiro (2005), The Engines of Viable Agriculture: Advances in Biotechnology, Market Accessibility and Land Rentals in Rural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53: 81-114.
  53. Solinger, Dorothy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4. Song, Lina (1999), The Role of Women in Labour Migration: A Case Study in Northern China, in Jackie West, Mingua Zhao, Xiangqun Chang, and Yuan Cheng (eds.), *Women of China: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69-89.
  55. Taylor, J. Edward, Rozelle, Scott, and de Brauw, Alan (2003), Migration and Incomes in Source Communities: A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 Perspectives from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1: 75-101.
  56. Todaro, Michael P. (1969),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1: 138-148.
  57. UNDP (1995),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8. Wang, Chunguang (2003), The Social Identities of New Generations of Migrants from China's Rural Area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4/4, Special Issue: *Peasant Workers Migration to China's Cities*, Qiang Li (ed.): 160-167.
  59. Woon, Yuen-fong (1993), Circulatory Mobility in Post-Mao China: Temporary Migrants in Kaiping County, Pearl Delta Reg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7/3: 578-604.
  60. Zhai, Fan, and Wang, Zhi (2002), WTO Accession, Rural Labou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China. *Urban Studies*, 39/12: 2199-2217.
  61. Zhang, Heather Xiaoquan (1999), Female Migration and Urban Labour Markets in Tianj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0/1: 21-41.
  62. Zhang, Linxiu, de Brauw, Alan, and Rozelle, Scott (2004),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 and its Gender Implication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5/2: 230-347.

(翻 译: 王 冉)

(责任编辑: 朱 犁)

## ABSTRACT

### **Lewis Turning-Points and Chinese Transition in Dual Economy**

Wang Chen · 2 ·

Different from the prediction of Lewis turning-point theory, the wage of the ordinary Chinese rural labor force increased by nearly 60 percent in recent years. This new development, defined as the new turning-point or "Quasi-Lewis Turning-Point", is brought about by many factors existing in the Chinese economy. However, some potential force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are probably going to alter the direction of the new turning-point and terminate this development. In face of the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o readjust its policies in real earnest to create a labor market environment of mutual trust and benefit and improve labor-capital relations.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a new generation of workers, 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meet the shortage of labour and return to the normal track of the dualistic development in the near future.

### **Preparing for Labor Shortage in China's Development in 21<sup>st</sup> Century**

Cai Fang · 11 ·

By analyzing the change in age structure, this paper first asserts the long-range trend of labor shortage. It then examines the possible impacts of the forthcoming labor shortage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n light of the changes in comparative advantage, human capital endowments, and resources alloca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policy suggestions of necessary adjustments in response to those challenges.

### **The Changing Profile of Chinese Labor Migration: What Lessons Can the Largest Flow Take From the Longest Flow?**

Kenneth Roberts · 17 ·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dynamics of Chinese labor migration, based upon an analogy with Mexican labor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t has now been over forty year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undocumented Mexico-U. S. labor migration, during which the profile of the migration stream has changed in significant ways. This paper uses the changes in that profile to identify factors at the origin, the destination, and the migration process that has affected its evolution over time, and looks to parallel factors in China that might influence the dynamics of migration there. If migration in China were to respond to changes in these factors in a fashion similar to that linking the U. S and Mexico, we would expect to see the following changes in the profile of Chinese migration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 more migration to the coastal cities, both because of the intensification of migration from current sending areas and the spread of migration to new areas, greater occupational diversification within destination areas leading to higher skill and education of migrants, more women and families in the migrant stream, and more settlement in the cities.

### **A Quantitative Study on Population-Economy Pressure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Chen Nan Wang Qinmin Lin Zongjian · 30 ·

The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population-economy pressure in China, based on which the Chinese provinc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ontemporary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Chin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pulation-economy pressure indexes used in this paper.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migration environment, employment will not be the onl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igration. Based on spatial interaction theory and the result of the analysis, we provide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economic system, suggesting new ways of thinking about law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ways of predicting regional population.